

于对立性而是超越对立的两端,如金刚经“实相非相,是名实相”的思维模式。审美的标准恰恰是佛学提供的“不落两边的中道思想”。师领认为,人不但有心还有灵,传统西方心理学就是研究“心”而无“灵”的内容。因此佛教更适合叫心理学,在全球一体化的文明冲突下,各宗教会成为一体化的世界宗教,由此为佛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佛教如何为未来世界宗教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佛教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黄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博士生;朱旭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硕士。)

## “太子灵踪文化研讨会”在山东汶上举行

黄夏年

2008年4月18日,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汶上县召开“太子灵踪文化研讨会”,就汶上佛教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法门寺博物馆的近30位佛教研究学者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黄心川、楼宇烈、杨曾文、金维诺等著名专家。汶上县委书记周桂萍在会上致欢迎词,县长孙琪介绍了汶上的历史和佛教文化资源。

学者指出,1994年,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北宋地宫出土大量文物,其种类之多,品质之高,保存之完好,在北宋考古史上甚为罕见,是迄今发现的北宋时期等级最高、历史背景清楚、纪年明确、艺术价值极高的佛教文物。其中,双膝跪姿“捧真身菩萨”造像为世所仅见,一百多件“七宝”为北宋皇室供品,曾被一方信众视为圣物的一枚佛牙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印证着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佛教崇拜状况。汶上的佛教受到了中原地区佛教的影响,佛风大畅,寺宇连陌,使这一地区成为重要的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地带。宝相寺的历史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明,但是寺内出土的文物却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这里出土的文物,历史线索清楚,有铭文记录,而且历史长,等级高,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重视。

学者们特别指出,由于舍利崇拜是一种信仰的活动,信仰是心理活动的反映,对舍利的研究与考证,就不能从真伪的角度来谈了。虽然我们不能判断舍利的真伪问题,但并不是不能说不能对它进行研究。因为舍利活动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历史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值得我们去进行考述,从中可以得到历史文化的痕迹。例如,舍利在古代中外交流的活动中,经常被作为信物和礼物赠送。在中国的史书里面记载了大量来中国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使节向朝廷贡奉舍利等的记载。佛教徒来中国都要带有经书和舍利两件重要的东西,像玄奘大师不仅带回来印度的佛经,而且还带回来舍利。所以舍利确确实实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联络了中外佛教徒的感情,推动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伴随着舍利崇拜的活动的一些历史记载的供奉物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例如山东汶上的佛牙出土以后,有长达170字的铭文,记载了这颗舍利迁徙的经过,经学者结合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了解这是到从宋代皇宫里流出来的舍利,所以从它的迁移过程,我们可以也就知道了宋代宫廷与民间供奉舍利的情况,还了历史真实的面目。所以每一次舍利的出土,对学术界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发现,舍利除了有宗教的崇高价值之

外，也是历史文化因素的深刻的反映。

与会学者认为，“太子灵踪文化”是汶上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领域涉及宗教、历史、考古、民俗、艺术、地理、旅游等诸多学科，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汶上当地以往在研究工作方面迈出了一定的步伐。今后，应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相关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 “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于 光

由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湖北省道教协会、武当山道教协会协办的“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4月19至23日在江城武汉如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陕西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相关学者、教界人士130余人齐集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上谈经论道。本次会议收到论文90余篇，围绕全真道人物与历史发展研究、全真道与老庄学、老庄研究三个子题展开研讨。

### 一、全真道人物与历史发展研究

本次研讨会全真道教为重点，论文的比重大，内容涉及较广，不少文章从新视角以新方法研究全真道的思想和传统。王树人《全真道教之文化底蕴初探——王重阳诗魂育全真评析》，以体悟的方法探讨全真文化特征。熊铁基《试论王重阳的“全真”思想》，从王重阳及弟子诗词入手，阐述其全三教之真、全老庄之真和全心性之真的“全真思想”。史新民《论古朴典雅的全真道乐》通过梳理道乐脉络探讨道教仪规。戈国龙《从全真道解脱观的形成看道教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从全真道解脱观形成的角度论述了道教具有的独特的民族特色，及道教超越民族性的局限而具有的普适性。20多年来对于全真道研究，宏观上说已经相当清晰了，但细微之处的研究仍然欠缺，很多文章以全真道某一点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究，如：王育成《道教微书艺术考略——以元代全真道细字绝技为主》，王体《略论全真道内丹修学中的“先天一炁”概念》，盖建民《元代道教学者朱思本〈輿地图〉科学思想略析》，唐大潮、周冶《上阳子陈致虚出家入道行迹略考》，魏小巍《全真道创教初期的“神通”现象与全真信仰的确立》，张应超《全真道创立初期马丹阳陕甘弘道述评》，王平《全真道与茶》，樊光春《王重阳终南遇仙的几个问题》，胡军《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之回顾》，刘迅《政治中的神仙：高云峒方丈与清末全真道在北京的眷顾和权力网络及其宫观扩张》，尹志华《北京白云观〈龙门门传戒谱系〉初探》，张凤林《吕祖传道度人事迹》等等。此外，注重发掘新的史料来填补以往研究的不足，也有一些考证性文章。如：吴受琚《半壁残碑——一桩公案》、王卡《诸真宗派源流校读记》、刘江《元宪元年李志常代祀岳渎考》、张方《全真祖庭——重阳宫石刻艺术简述》等。有唐明邦《道教